



中国近代
文学丛书



苏曼殊小说诗歌集

中国近代文学丛书
苏曼殊小说诗歌集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184千字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3,000册
统一书号: 10190·114 定价: 0.81元

编辑说明

中国近代文学是我国宝贵的文学遗产。为促进对近代文学的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特编辑《中国近代文学丛书》，有计划、有选择地分辑出版中国近代文学作品，以满足研究工作者、教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急切之需。

编入本丛书的小说、戏剧、诗词、散文等，都选择思想内容较好，艺术性较高，在当时或以后曾发生较大影响，有一定代表性或研究价值的作品。

为给研究工作提供可靠的第一手材料，所收作品均据不同版本作校点；除改正明显的错误之外，都不作内容和文字的删改。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近代文学研究组

一九八一年九月

前 言

—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①。苏曼殊就是辛亥革命时期“首先觉悟”的知识分子之一。

苏曼殊，原名戡，字子穀，后更名元瑛，改字子谷，曼殊是他出家以后自取的法号。此外，他受当时文坛风气的影响，还使用过四十来个其他别号^②。

苏曼殊原籍为广东香山县^③。其祖父苏瑞文以经营进出口业起家。其父苏杰生是旅日华侨，在横滨任某英商洋行买办，娶一妻三妾，长妾河合仙是日本人。苏曼殊即于一八八四年出生在横滨。不过苏曼殊的生母并非苏杰生的妻妾，而

① 毛泽东：《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3月版，第546页。

② 张静庐、李松年：《辛亥革命时期重要报刊作者笔名录》，《文史》第1辑，中华书局1962年10月出版。

③ 吴海林、李延沛所编《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版）说苏曼殊的籍贯为“广西花县”，这是错误的。

是河合仙的妹妹，名叫若子^①。这就是说，苏曼殊既是私生子，又是混血儿。在宗法观念严重、华夷之别严格的封建社会里，苏曼殊的这种“不光彩”的出身，决定了他必然被人歧视的命运。他刚刚出世，母子二人便被赶出了苏家之门，母亲带他在外祖父家居住三年。后因苏家生女多而生男少，苏曼殊才被领回广东老家，但拒绝苏曼殊的母亲再入苏家。从此，母子分离，终生不复一见。苏曼殊的整个童年时代，实际上等于生活在后娘的虐待之下。比如在他十三岁那年，曾经害过一场大病，不仅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反而被“置之柴房以待毙”^②。其他概可想见。

苏曼殊九岁那年，苏杰生经营失败，苏家破产。从此一蹶不振，每况愈下，以致苏曼殊从十三岁起，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他先在上海姑母家寄食，十五岁（一八九八年）时，接受其表兄林紫垣的资助，到日本去求学，前后在横滨华侨所办大同学校学习四年，东京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学习

① 关于苏曼殊的血统问题，过去曾经长期争论不休，概括起来，有过以下三种说法：（一）认为苏曼殊是日本人宗郎和河合仙所生，因宗郎早逝，河合仙才带他改嫁旅日华侨苏杰生。（二）认为苏曼殊是苏杰生和他的长妾河合仙所生。（三）认为苏曼殊是苏杰生和苏家所雇日本女佣人若子所生。第一种说法完全错了，第二、三两种说法也不完全正确。直到一九六九年，苏曼殊的同父异母妹妹苏惠嫻才对这一问题作了彻底澄清。她说：“第二庶母河合仙氏，入苏家已多年，未有所生。……斯时仙姐有妹，名若子，年在妙龄，已随其姊入苏家，愿作偏室。惟先父……未得双亲允许，仍未再纳偏室。但同居日久，已身怀六甲，正是曼殊兄在出世前之时期。”“曼殊兄确实是河合氏之妹‘若子’所生”。均引自《亡兄苏曼殊的身世——致罗孝明先生长函》，载《传记文学》第32卷第2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2月出版。

② 苏惠嫻：《亡兄苏曼殊的身世——致罗孝明先生长函》。

一年，成城学校学习数月。在将近六年的留学期间，苏曼殊一直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比如他在东京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学习时，“因林氏只月助十元，仅敷下宿屋膳宿两费。乃刻苦自励，迁于最低廉之下宿屋，所食白饭和以石灰，日本最穷苦学生始居之。曼殊竟安之若素，不以为苦。每夜为省火油费，竟不燃灯”^①。

成年以后的苏曼殊，其景况也没有什么改善，他没有固定职业，只得四处流浪，以上海为中心，足迹遍江苏、浙江、湖南、安徽、广东、香港以及日本和东南亚各地。有时以教书为生，有时靠卖文过活，有时寄食于寺院，有时乞贷于朋友，有时“贫绝穷饿不得餐，则拥衾终日卧”^②，有时甚至把金牙敲下来换烟抽。终于在五四运动前夕的一九一八年，穷愁潦倒而死，享年仅三十五岁。

苏曼殊虽然出身于富有的商人家庭，但由于他的特殊身世和家庭的中道衰落，使他终生过着连小资产阶级都不如的艰难生活；而且他生活在国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时代，又长期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潮的熏陶。这一切因素，使苏曼殊避免了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弯路，直接投入了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一九〇二年，中国留日学生的第一个革命团体——青年会在东京成立。由于它以排满兴汉的民族主义为宗旨，“留学界中赞成者极为少数”^③。而当时只有十九岁的苏曼殊却

① 冯自由：《苏曼殊之真面目》，《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6月版，第167页。

② 柳亚子：《苏玄瑛传》，柳无忌编《苏曼殊年谱及其他》，北新书局1928年1月版，第42页。

③ 冯自由：《青年会与拒俄义勇队》，《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6月版，第104页。

“至为乐从”^①，欣然加入。这说明，即使在当时革命思潮最为高涨的留日学生中间，苏曼殊也是最先觉悟的分子之一。

一九〇三年四月，沙俄拒绝按照《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撤退侵略军，并向清政府提出进一步霸占我东北的七项无理要求。消息传出后，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中国留日学生也组织了拒俄义勇队，报名参加者二百余人，青年会成员集体加入，苏曼殊被编入甲区队第四分队。拒俄义勇队本来只是一个单纯的反帝爱国组织，它的宗旨是“在政府统治之下”，“代表国民公愤”，“担荷主战责任”^②。不料清政府反诬他们是“名为拒俄，实则革命”^③，一方面要求日本政府勒令解散拒俄义勇队，一方面又密谕各地方官吏搜捕回国活动的留日学生。在清政府的压迫之下，拒俄义勇队成员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害怕起来，退出了该组织；而另一部分人则从清政府的倒行逆施中，认清了它的卖国面目，丢掉了对它的幻想，更加坚定起来。他们改拒俄义勇队为军国民教育会，并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④为宗旨，把矛头指向了清政府。苏曼殊早在加入青年会时，已经赞成反清革命，因而在军国民教育会里表现得异常积极和坚定。当时资助他上学的林紫垣极力反对他参加革命活动，甚至以断绝资助相威胁。苏曼殊断然顶住了林紫垣

① 冯自由：《苏曼殊之真面目》，《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6月版，第169页。

② 《学生军规则》，《湖北学生界》第4期，1903年4月27日出版。

③ 《密谕严拿留学生》，《苏报》1903年6月5日。

④ 《军国民教育会公约》，《江苏》杂志第2期，1903年5月27日出版。

的威胁，宁可丢掉饭碗和中辍学业，也不肯放弃革命。林紫垣恼羞成怒，强迫苏曼殊回广东。苏曼殊不得已，于一九〇三年九月回到了上海。他寄给林紫垣一封假遗书，内有“今日黄浦投江死”^①之句，表示与林紫垣一刀两断。

苏曼殊回国后，先在苏州吴中公学任教，并为革命志士所办报纸《国民日报》撰稿。此时正当“苏报案”发生后不久，全国人民反清、反帝的革命思潮异常高涨。这更激发了苏曼殊的爱国热情，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发表了小说《惨世界》^②，杂文《女杰郭耳纒》、《呜呼广东人》，诗《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二首。他在这两首诗中写道：

蹈海鲁连不帝秦， 茫茫烟水着浮身。
国民孤愤英雄泪， 洒上鲛绡赠故人。

海天龙战血玄黄， 披发长歌览大荒。
易水萧萧人去也， 一天明月白如霜。

这两首诗，就是当时苏曼殊思想的真实写照。同年冬，《国民日报》停刊，苏曼殊拿着从日本带回的冯自由的介绍信，前往香港会见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负责人陈少白，希望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由于误会，遭到了冷淡的待遇。苏曼殊此时空有救国之志，而无救国之门，且又生计断绝，无计可

① 苏惠嫻：《亡兄苏曼殊的身世——致罗孝明先生长函》。

② 《惨世界》（又名《惨社会》）全书共十四回，开头六回和最后一回译自法国雨果（苏曼殊译作“器俄”）的《悲惨世界》，只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中间七回是苏曼殊的创作，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二。可见此书基本上应该看作是苏曼殊的作品。

施，于是跑到广东惠州某破庙削发为僧。然而脱离红尘的和尚生活，显然是与苏曼殊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相违背的，因而还没有等到取得正式和尚资格，便乘师父外出募化之机，偷了已故师兄博经的度牒，逃回了香港。可见苏曼殊的出家，是出于走投无路或一时气愤。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虽然从此而自称“曼殊和尚”，但除了有时剃剃光头、穿穿袈裟之外，与常人毫无不同之处，并且依然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就在他“出家”后刚刚回到香港的一九〇四年春，因愤于保皇派猖獗，曾决心用手枪暗杀保皇派头目康有为，经陈少白极力劝阻，才没有实行。同年秋，苏曼殊又在湖南长沙加入了黄兴领导的华兴会，并参与了该会准备在长沙举行武装起义的策划工作。起义因事先泄露而流产后，苏曼殊又参加了华兴会部分会员在上海举行的秘密会议，会议决定在上海另立爱国协会，准备暴动和暗杀工作。

上述事实说明，早期的苏曼殊，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而且是先驱者之一。

二

不过，苏曼殊主要不是一个革命的活动家，而是一个革命的文学家；他的主要功绩不在于对旧世界进行“武器的批判”，而在于运用“批判的武器”，为辛亥革命开辟道路。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状况，规定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是，由于满洲贵族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利益的代表者，而且曾经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进行了二百多年的民族压迫，积累了深刻的民族仇恨，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最强调的口号

是“排满”。苏曼殊也不例外。他认为，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满洲贵族，是一伙“抢夺了别人国家的独夫民贼”，是造成中国国弱民穷的根源所在。因此，他千方百计激发全国人民的反满情绪。一方面，他极力颂扬历史上汉族的民族英雄，如宋末蹈海殉国的陆秀夫，明末客死日本的朱舜水，明末起兵抗清的郑成功等，用以唤起人们的民族感情。另一方面，则效法革命党人印发《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记》的办法，专门搜集清兵入关之初，残酷屠杀广东人民以及广东人民英勇反抗的历史记载，写成了《岭海幽光录》，“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①。这里举一则短故事为例：

丁亥某月，益阳王遇害广州。妃某氏，色美，清兵欲妻之。妃曰：“王，故夫也，亟俱棺衾，得尽一哀，以事新者，当无复恨。”兵出市棺衾，妃阴置小刀数十袖衣中，整刃外向。丧服哭泣视含殓，与兵出葬北山。既毕，兵遽前犯妃，妃大骂。兵怒，抱持益急，身数十处触刃，血漉漉仆地。妃乃反刃自杀。

短短百十个字，不但揭露了清兵的罪行，而且塑造了一个机智勇敢的女性形象。这样的作品出现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夕，无疑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不可否认，苏曼殊强调“排满”，确实说明他具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而且这种宣传很容易产生掩盖反帝反封建这一根本任务的消极作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次要的方面。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个口号的作用主

^① 鲁迅：《杂忆》，《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04页。

要是积极的。这是因为，从鸦片战争以后，满洲贵族所把持的朝廷，不但完全丧失了保卫自己祖国的能力，而且逐渐沦为“洋人的朝廷”，它奉行“宁赠友邦，不予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政策，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充当了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因此，反满也就是反帝，也就是爱国主义的表现。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①其次，在满洲贵族统治中国的二百多年中，“排满”这个口号始终是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反抗清政府统治的共同口号，具有极大的号召力。辛亥革命时期强调这个口号，无疑可以最大限度地团结革命力量，孤立反动势力。因此，无论就这个口号的实质还是它在当时所具有的策略意义，都是应该肯定的。

苏曼殊的反帝情绪除了通过反满的曲折方式加以表现之外，还通过别的方式反映了出来。比如他在一九一〇年写道：“上国亦已芜，黄星向西落。青骊逝千里，瞻乌止谁屋？江南春已晚，淑景付冥莫。建业在何许？胡尘纷漠漠。”诗中不但写出了帝国主义列强蹂躏我国大好河山和我国人民流离失所无所归依的残酷现实，而且反映了作者对帝国主义完全灭亡中国的无比担心。再如，英国诗人拜伦，不但写了不少具有“叫喊复仇和反抗”^②精神的诗歌，而且亲自参加过希腊的民族独立战争，是一个同情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士。苏曼殊把拜伦引为异国知己，终生对拜伦怀着崇敬的感情，不但翻译了《拜伦诗选》，而且到处引用拜伦的诗歌。这当然也应看作是苏曼殊反帝思想的曲折反映。至于苏

① 《唯心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3月版，第1517页。

② 鲁迅：《杂忆》，《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04页。

曼殊翻译印度小说《娑罗海滨遁迹记》，其用意就更加明显了。该书写了这样一个故事：英帝国主义灭亡了印度，并且对印度人民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或以麻绳束之树梢，揭銃射之，而观其避丸也；或以刃剜肠，塞以败絮，而观其手舞足蹈也；或以尖针钉其两目，投向潮流，而观其浮沉上下也”；或用大炮轰击人群，而诡称是“传布上帝爱人之道，若午夜钟声也”。印度人民忍无可忍，前后三次奋起反抗，虽然均遭失败，但他们大义凛然、英勇复仇的精神，却可歌可泣。苏曼殊把这样的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显然有两个目的：一是用印度灭亡的事实，向中国人民发出警告；二是用印度人民的反抗精神，来激励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此外，苏曼殊对帝国主义的奴才——买办、西崽之流，也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在《呜呼广东人》一文里，对这些无耻之徒的丑恶嘴脸作了维妙维肖的描绘：“把自己的祖宗不要，以别人之祖宗为祖宗”；“把自己祖国神圣的子孙弃掉，去摇尾乞怜，当那大英大法等国的奴隶，并且仗着自己是大英大法等国的奴隶，来欺压自己祖国神圣的子孙”。这里应该特别指出，苏曼殊的家庭就是靠吃洋饭发财的，他的父亲就做了一辈子买办，他的其他亲属和亲戚当中也不乏这一流的人物。因此，他对帝国主义奴才的谴责，也就更加难能可贵。

苏曼殊反封建的思想也是相当强烈的，他的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传统观念的许多方面。早在一九〇三年，即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尚处于准备阶段，而苏曼殊也只有二十岁的时候，他就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圣人”孔子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这里应该指出，反孔思想当然不自苏曼殊始，我国历代农民起义领袖和某些封建文人，都对孔子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批判。但是，苏曼殊的反孔思想却有新内容。第一，他是从资产阶级

要求自由、平等的观念出发，来批判孔子学说的，因而指出孔子的学说是“奴隶教训”。第二，他的反孔思想又是建立在对于劳动人民的正确认识基础之上的。这可以他批判孔教中的“孝道”为例。他说：“凡人做事，都要按着天理做去，却不问他是老子不是老子。而且我的身体虽是由父母所育，但是我父母，我祖宗，不仗着世上种种人的维持，哪能独自一人活在世上？就是我到这世上以后，不仗着世上种种人的养育教训，也哪能到了今日？难道我只好报父母的恩，就把世上众人的恩丢在一旁，不去报答吗？”更为难得的是，苏曼殊还进一步提出了用“良心”来代替传统观念的观点，认为：“为人在世，总要常时问着良心就是了，不要去理会什么上帝，什么天地，什么神佛，什么礼义，什么道德，什么名誉，什么圣人，什么古训。”当然，试图用“天理”、“良心”来对抗封建传统观念，显然是软弱无力的，这反映了资产阶级缺乏思想理论武器的弱点。但是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发聋振聩的见解，对于解放人们的思想是有积极作用的。

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在辛亥革命之前，苏曼殊排满、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是比较突出的，这说明他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思想是一致的，确实起到了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制造革命舆论的作用。

但是，在任何革命队伍中，人们的思想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在根本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各个成员的思想总会有自己的特点。参加辛亥革命运动的分子尤其复杂，因而他们的思想差别也就更为显著。苏曼殊不幸的身世和坎坷的遭遇，决定了他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小资产阶级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他同情穷人，憎恨富人，反对剥削和压迫。他借作品人物的口说：“我看世界上的人，除了能作工的，仗着自己的本领

生活；其余不能做工，靠着欺诈别人手段发财的，哪一个不是抢夺他人财产的蠹贼呢？这班蠹贼的妻室儿女，别说‘穿吃’二字不缺，还要尽性地奢侈淫逸。可怜那穷人，稍取世界上些些东西活命，倒说他是贼，这还算平允吗？”因此他得出了如下正确的结论：“世界上有了为富不仁的财主，才有穷无立锥的穷汉。”苏曼殊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一方面认识到封建专制制度的极端不合理，一方面也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因为他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也是少数资本家“压抑贫民”的一种“恶组织”。因而提出了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公道的新世界”的主张。

苏曼殊关于“新世界”的理想，概括起来就是：在政治上，无论“公侯贵族劳动者”，应该毫无“区别”地一律平等；在经济上，则应实行“世界上物件，应为世界人公用”的原则。具体来说，也就是苏曼殊在《惨世界》里借法国雅各宾党的名义所提出的那五条“规矩”，其中最主要的是这样两条：一是“取来富户的财产，当分给尽力自由之人以及穷苦的同胞”；二是“法国（这里的“法国”实际上是暗指中国，下同。——笔者）的土地，应当为法国的人民的公产，无论何人，都可以随意占有，不准一人多占土地”。换句话说，就是无偿地没收富人的财产和土地，平均地分给全国公民。在当时，这种主张是相当激进的。即拿土地问题来说，“平均地权”的口号虽然写进了同盟会的纲领之内，但并不是所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都同意的，比如革命派的骨干分子陈天华就没有接受这种主张。可见仅从这一方面来说，苏曼殊的思想达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水平。当然，苏曼殊的这种理想，在当时只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可能将它实现。但是，它的进步性是不

可抹煞的，正如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在当时也不可能真正实现，而我们不能抹煞它的进步性一样。

三

辛亥革命的胜利，曾使苏曼殊欣喜若狂。他从爪哇给柳亚子和马君武写信说：“迺者振大汉之天声，想两公都在剑影光中，抵掌而谈。不慧远适异国，惟有神驰左右耳。”又在另一封给柳亚子的信中说：“壮士横刀看草檄，美人挟瑟请题诗。遥知亚子此时乐也。如腊月病不为累，当检燕尾乌衣典去，北旋汉土，与天梅、止斋、剑华、楚仓、少屏、吹万并南社诸公痛饮十日。然后向千山万山之外，听风望月，亦足以稍慰飘零。”这种在苏曼殊的作品中极其少见的欢乐心情，一方面说明了苏曼殊对辛亥革命的成败至为关切，一方面也暴露了苏曼殊思想的幼稚，他把辛亥革命仅仅推翻了一个封建皇帝的事实，当作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了，因而产生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想法。不过，无情的现实很快就打破了苏曼殊的美梦，辛亥革命的果实，几乎立刻就被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利益的大军阀袁世凯所篡夺，剩下的只是一个“民国”的招牌；而且就连这块招牌也大有得而复失的危险，比如袁世凯就一心要称帝，张勋更妄图复辟。在此局面下，原先的革命派发生了分化，除了孙中山等少数人外，有的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飞黄腾达起来；有的悲观绝望，颓唐消沉下去；有的退出了政界，去当寓公或资本家；有的更后悔当初参加革命，甚至骂革命。就连鲁迅这样坚定的革命者，当时也陷入了徬徨苦闷之中，埋头于读古书和抄古碑帖了。苏曼殊也是相当消沉的。但是，苏曼殊决不象某些论者所说，

从此“走上消极颓唐，用醇酒妇人来排遣苦闷的道路”。

首先，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原先的不少革命党人“皆乘时得位”^①，成了民国的要人。他们慕苏曼殊之名，都争相加以罗致。此时的苏曼殊，即使不想做官，只要能够与那些新贵们虚与周旋，至少不愁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条件。可是他生性“不从流俗”，“凡委琐功利之事，视之蔑如”^②。因此宁肯卖文自给，或向穷朋友三番五次地乞贷，也不肯“一履”达官显宦之门。可见在众人争名夺利的齟齬环境之中，他依然能够保持超然物外、洁身自好的高风亮节。无怪乎章太炎称赞他是“厉高节，抗浮云”的“独行之士”^③。

其次，辛亥革命失败之后，苏曼殊依然满怀着忧国忧民的感情，依然关心着救国救民的大事。“水晶帘卷一灯昏，寂对河山叩国魂。”“相逢莫问人间事，故国伤心只泪流。”这虽然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息，但那家国之痛的感情却是异常深沉的。不仅如此，苏曼殊也曾经为捍卫辛亥革命的成果而做过一定的努力。比如当一九一三年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时，苏曼殊就发表了《讨袁宣言》，对袁世凯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说他“擅屠操刀，杀人如草”；“辱国失地，蒙边夷亡；四维不张，奸回充斥”。并断然表示：“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今直告尔：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亟，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褫尔之魄！”如此激昂慷慨的文字，在苏曼殊一生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这说明苏曼殊对袁世凯篡夺

① 柳亚子：《苏玄瑛传》，柳无忌编《苏曼殊年谱及其他》，北新书局1928年1月版，第42页。

②③ 章太炎：《书苏元瑛事》，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4卷，北新书局1933年版，第134页。

辛亥革命的果实是多么愤慨。为了配合全国人民的反袁斗争，苏曼殊更对袁世凯统治下的黑暗现实进行了揭露。比如袁世凯在一九一五年加紧推行帝制复辟活动，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孙中山领导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苏曼殊即在此时发表了小说《焚剑记》，作品中所写的官兵烧杀抢掠和人民“以人肉为粮”的凄惨情景，显然就是袁世凯统治下的黑暗现实的缩影。这一些事实说明，苏曼殊的表现，同当时正在进行的反对袁世凯倒行逆施、保卫辛亥革命胜利成果的斗争是完全一致的。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苏曼殊继承了辛亥革命的未竟之业，坚持了反帝反封建的方向。例如，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九日，荷兰殖民地爪哇岛泗水市的华侨集会，庆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遭到荷兰当局的镇压，华侨三人被打死，十余人被打伤，百余人被逮捕。华侨全体罢市，以示抗议，荷兰当局出动军队进行更大规模的镇压，华侨被捕人数竟达一千多。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暴行，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南京政府也出面交涉。当此之际，苏曼殊写了《南洋话》一文，历述了华侨开发爪哇的历史功绩，谴责了荷兰殖民主义者“以怨报德”、虐待华侨的罪行，得出了“荷兰者，真吾国人九世之仇也”的结论。并向政府提出了两项要求：一是“非废却一切苛则弗休”；二是“重订商约，遣舰游弋，护卫商民”。这样直接抨击帝国主义的文章，苏曼殊在辛亥革命以前是没有的，可见他的反帝思想更有所发展。此外，他对资本家“两个钱总比一个钱好”的拜金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物质文明”也有较清醒的认识。如他借作品人物之口说：“人谓美国物质文明，不知彼守财虏，正思利用物质文明，而使平民日趋于贫。”在崇洋风气已经盛行的当时，这种见解尤其难能可贵。